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精品

文/图　陈永耘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前身是1959年9月成立的宁夏地质博物馆筹备处，197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正式成立，馆址位于银川市承天寺院内。2004年新馆建设被列为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的献礼工程。2005年11月27日，新馆建设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馆址位于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路东侧。2008年8月28日，新馆正式开馆使用。

新馆总建筑面积30258平方米，高21.2米，共四层。主体建筑平面呈“回”字型布局，出入口立面借鉴了回族的传统民居木雕图案，与三层外墙局部装修所采用的玻璃幕墙，形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美感的强烈对比；上部透空隔架与下部石材结合，充分表现整个建筑优雅、简洁、均衡、沉稳的个性。外墙装饰所运用的迦陵频迦、力士志文支座等建筑构件形象，以及墙面使用的装饰图案，是宁夏历史文化遗存的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宁夏博物馆现馆藏文物四万多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四千余件，经鉴定确认的国家一级文物159件，胡旋舞石刻墓门、鎏金铜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西夏文物、回族文物是馆藏重点。贺兰山岩画、红军西征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文物也很具有代表性。新馆陈列分通史篇、专题篇和临时篇三大版块八个展览，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宁夏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朔色长天——宁夏通史陈列》通过“文明曙光、农牧家园、丝路重镇、大夏寻踪、塞北江南”五个章节，把宁夏自远古至今三万年间形成的水洞沟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全面、真实、鲜活地展示在3000平米的空间内。“石刻史书、红旗漫卷、回乡漫步、辉煌塞上”四个专题陈列，分别展现了宁夏岩画的艺术特色；自辛亥革命至解放时期宁夏的革命历史；宁夏回族的生活、文化、宗教习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58年成立以来，五十年的长足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五彩华章、笔墨春秋、方圆史话”三个临时陈列，再现了各个窑口基本形成序列的馆藏瓷器精品、馆藏书画、馆藏及个人收藏钱币精品，富有西北地域特色。

陶托绿松石颈饰

1975年固原店河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陶托，径2.8厘米、高1.3厘米；骨珠，径0.2厘米～0.37厘米、孔径0.1厘米～0.15厘米。陶托外形为一束腰、两面内凹的圆形陶器，在其一面周围粘有数十枚规则不一的薄平绿松石，骨质串珠颈饰由大小不一的骨珠组成。





虎噬驴透雕铜牌

春秋战国，1973年固原杨郎匈奴墓葬出土。同墓共出土两件。长13.7厘米、宽8.2厘米，每件的整体造型呈"B"形。猛虎作行进状，张口咬噬驴的颈部，驴身翻转搭靠在虎背上，作挣扎状。虎身饰斑纹，驴蹄以凹叶状纹表示。两件器物构图相同，左右对称，分别有孔、扣，应相配使用。



错金银铜羊

西汉，1977年固原古城乡出土。铜铸，长8厘米、高5.5厘米。作蹲卧式，盘角，回首，鼻梁至尾端镶嵌一条金线，金线两侧用粗细不一的金、银线镶错成卷曲的毛状图案。造型神态生动、活泼，工艺极为精湛。





胡旋舞石刻墓门

唐代，1985年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每扇门均呈长方形，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两门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胡旋舞"男伎。所刻男伎为典型的胡人形象，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着出自康国、在唐代非常盛行的胡旋舞。四周剔地浅浮雕卷云纹，舞伎似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飞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题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的生活气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

错银云纹铜镦

战国，1968年固原头营出土。高6.9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2.6厘米，细腰圆筒形，上端有銎，可装入戈、戟的木柲，在其外表及底部，用细小的银片和银丝镶嵌，构成布局完整的卷云纹及曲线图案，然后挫平，工艺精湛。



皈依罐

宋代，1972年固原县北门外机砖厂宋墓出土。通高68厘米，器物共分5层，由下至上依次为底座、花边口沿钵、舍利罐、覆莲盖、葫芦形塞。底座下大上小，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四周兽头头顶圆环，颈部拉长做支柱，环边饰莲花宝珠；上部塑四力士，手托圆环，圆环周围饰莲花宝珠。高圈足花边口沿钵置于圆环正中，钵中腹贴塑一周乳突纹。钵上置一敛口鼓腹舍利罐，腹中贴塑一周乳突、卷草纹。覆莲盖扣于舍利罐上。盖上为葫芦形塞。器物的五个部分装置紧凑，似为一体，纹饰手法富于变化，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装饰华丽，整体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感觉。

耀州窑刻花卉纹盖缸

宋代，固原县文物站出土。高12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6.8厘米，整个器型分为两部分：上部为器盖，盖顶有钮；下部为缸，直口，圈足。通体施以淡豆绿色釉，釉面光滑，装饰有大团刻划花叶纹饰，圈足脱釉。造型端庄大方，刻划线条圆顺明快，釉色青中闪黄，胎质坚密，耀州窑瓷的特色，由此可窥见一斑。



菱花形人物楼阁纹铜镜

宋代，隆德县观庄宋墓出土。直径18.5厘米，菱花形，圆钮。主题纹饰为山水人物画，以群山为背景，左边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桂树，右边是单檐庑殿顶的房屋，门旁有玉兔在捣药，下边是弧形梁式桥，桥下河水汹涌。门半闭半启，一人侧身远眺，门前椅上坐一长者，着袍束带，身旁两侧分别侍立着手执宝扇的金童玉女，皆目视桥头。桥头一人，头戴高冠，侧身弯腰拱手。菱花形缘，通体鎏金。整个镜面构图丰富，造型盈巧，是宋代典型的人物故事镜。

鎏金铜牛

西夏，1977年银川西夏陵区177号墓出土。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千克，青铜铸造，中空，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体态健壮，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造型形象逼真，形体健硕。该铜牛制作时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鎏金等工艺集于一体，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另一方面，说明了牛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研究西夏社会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描绘出西夏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石马



西夏，1977年银川西夏陵区177号墓出土。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重355千克，西夏石雕大体上有陵墓石雕、碑刻、石刻塔和摩崖造像等，其艺术特征浑厚朴实、饱满丰腴、雄健奔放、坚实粗犷。该石马砂岩圆雕，四肢屈膝跪卧，马头稍垂，颈部呈弯曲状，瞪目立耳，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身体肥壮浑圆，比例匀称，线条简洁凝练，姿态雄健，继承了汉唐的雕刻风格，生动地再现了西夏马的形象，不失为西夏石雕艺术的精品。

从西夏陵区发掘情况可以推测，铜牛和石马可能是西夏贵族、重臣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之一，它们不仅反映了西夏党项族对马等家畜的珍爱，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红陶五角花冠迦陵频迦



西夏，2001年银川西夏陵区3号陵出土。红陶质，高38.8厘米、宽30.5厘米、长27.5厘米。人首鸟身，戴五角花冠，头顶束三分式发髻，宝缯垂于肩前；长方脸，脸颊肥腴，隆眉上有阴刻弧线，细长眼，额心有白毫，上眼睑下垂呈俯视状，鼻准高，方嘴厚唇，大耳下垂；戴双环镶花项圈，平胸，双手合十于胸前，手镯无花饰；双翅展开，长尾高翘，双腿连爪跪骑于贴塑双线卷云纹的长方形座上。在宋人所著的《营造法式》中，有关于作为建筑脊式的迦陵频迦的记载，不过，其称谓是“嫔迦”，但目前尚未有实物发现，只说明宋代存在有这一建筑式样。2001年在西夏陵区所发现的迦陵频迦，是以建筑构件的形式存在的，具有装饰效用，这一发现尚属首次。同时，也说明了迦陵频迦的流行，不仅主要集中在唐、辽两朝，还包括西夏。这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内容，为研究佛教在西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西夏，1974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圆雕，白砂石质，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近似正方体。圆雕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突，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托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3行，计15个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2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3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弥足珍贵。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迄今在西夏陵区多座帝陵的碑亭遗址中，已出土这类支座11件，但刻有西夏文字的仅此一件。至于支座的用途，有人根据其放置在碑亭中心、周围发现大量石碑残片、西夏陵一号陵所发现的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等发掘资料，认为它是碑座；有人根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及8号陵所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等发掘资料，断定支座是立木石础。西夏时期支座究竟做何用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西夏文寿陵残碑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7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西夏陵区9座帝陵共有碑亭遗址16座，曾屡遭洗劫，所得残碑极破碎，多为三五字，一二十字者更为少见。此块残碑白砂石质，由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宽49厘米、长 28.5厘米，为拼合后留存西夏文字最多的一块，共11行44字，实为珍品。墓碑正文为阴刻楷书的西夏文字，结构饱满匀称，字体刚劲、挺拔、美观，凿刻刀法娴熟。每字边长约3厘米，字体鎏金，有的笔画内金箔犹存。译文为：受后魏典/也义残/文武皆备/世各显也不妙也乎/深院惇懿略具足/内家未与悟故/行者钟鼎家/而岳/方立起/上藏/负。它充分反映了西夏文字的结构特征。

荔枝纹金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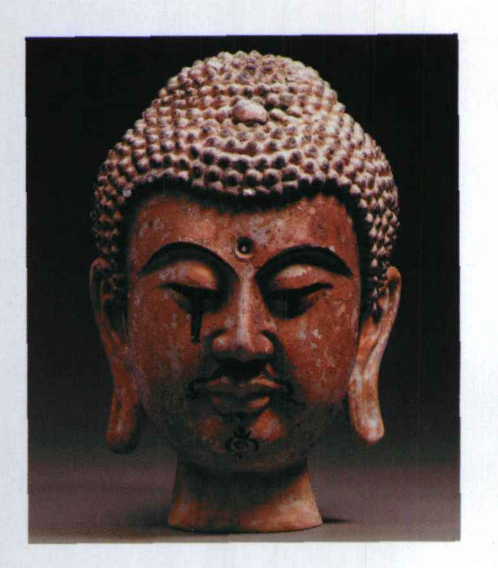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该饰件长5厘米、宽2.1厘米、厚0.4厘米、重11.7克，通体呈长方形，用纯金捶碟而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凸出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为圆点纹，背面左右两端各有一横穿。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纯金工艺品，而且是西夏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有力的实物佐证。西夏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文思院”，其职能是“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普通百姓禁止使用金器，违者处以重罚。正是由于皇室贵族的垄断和占有，西夏的金属制品工艺十分精良，器物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





竹雕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长7.5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通体呈长方形。细浅阴刻，左边上端有一圆孔，右端已残。器表精雕细刻出当时中原人的生活场景：以庭院、松树、假山、窗户、花卉为背景，烘托出两位头扎发髻、身着宽袖长衫、腰间系带，形神各异的男子。一人正轻手轻脚，企图捕捉飞落在草丛中的虫鸟；另一人静立在屋檐下袖手旁观。所雕人物形象逼真，构图布局适宜，造型美观。此物应为西夏与宋朝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彩绘泥塑佛头像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高36厘米、正面宽24.2厘米、侧面宽24厘米，佛头像中空。头顶为螺髻，中间有一白色肉瘤。面部方颐，双眉隆起，眉间有白毫。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系高温下眼珠釉料熔化流出所致。佛鼻梁高直，双唇闭合，厚唇上墨线绘出八字胡须，下颌用墨线绘出日、月、云状纹饰。塑像月牙形眉毛，深目，与额头连成直线的高鼻，使佛像面部表情显得平淡、冷静；半闭双眼，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丰腮、下巴圆润、眉如弯月、嘴唇短厚、圆而近方的脸型特征，富有唐代造像遗风。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夏，1991年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纵30.7厘米、横38厘米，刻本，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10行，每行22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具有明显的活字版印本特征，如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很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墨色浓淡不匀，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的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等，这些都是在雕版印本上不可能出现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而与泥活字版有明显区别。另外，有些字行间长短不一的线条，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加条痕迹。这说明元代王祯《活字印书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鎏金文殊菩萨铜造像



1986年银川市新华街出土。通高58.5厘米、正面宽46.5厘米、侧面宽25.5厘米、净重28.8千克，青铜质，通体鎏金。上部文殊菩萨头戴高冠，面部圆润，大耳垂肩，双目微合。身着宽袖紧身天衣，胸佩璎珞，飘带绕体，手持如意，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下垫一火云纹蟠龙戏珠图案的披毡。下部坐骑为一头狮子，两眼圆睁，尾巴卷曲。菩萨神态安详，狮子侧首伏卧，呈现出既驯服顺从又不失威猛雄健的神态。同时出土的青铜文物共10件，其中有7尊佛教人物鎏金造像。这几尊造像，出土时金光灿灿，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比例匀称、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工艺和学术研究价值。关于这批青铜器的断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学者从出土现场的地层关系及制作工艺推断，认为应属于西夏后期；而亦有学者从器物的造型及制作风格上分析，认为其更接近于明代。



彩绘泥塑罗汉像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高63.5厘米、正面宽42.4厘米、侧面宽31厘米，罗汉圆顶光头，粗眉细眼，眼珠乌亮，眼角稍翘，鼻梁高直。结跏趺坐，双手已残。身着交领袈裟，腰部束带，外穿右袒大衣。袈裟用黑色衬底，上绘白色团花。大衣用黑色绘出格子图案，领边和方格图案内刻画繁密的花卉纹，纹饰上贴有金箔，但多已脱落。此像体态丰满，神态怡然，形神兼备。纹饰线条流畅，技法运用纯熟。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度。在敦煌莫高窟、武威和张掖、黑水城遗址、西夏陵区、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皆有西夏佛教泥塑的发现。宏佛塔出土的佛教泥塑作品，既继承了唐宋彩塑的传统手法，又具有西夏造型特征，每一尊塑像都是一件独立完美的艺术品。



西夏文大号字木雕印版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长13.7厘米、宽23.3厘米、厚2厘米。该雕版为大号字版，版上每字1厘米～1.2厘米见方，字体方正，表面整齐平滑，刻工娴熟有力。版面中间有宽1厘米的中缝，中缝两侧各竖刻6行西夏文字，其中最长一行残存10个西夏文字，行距0.6厘米～0.8厘米，字距0.1厘米，中缝上亦刻有3个西夏文字，较版面上字略小，雕版背面平整无字。这类雕版发现较少，共7块，版厚字大，且只一面雕字，所印书籍当是疏朗清晰，质量上乘，应是皇室或财力充裕的官府、寺庙所刻。此块残版是宏佛塔槽室内所发现的两千多块残版中最大的，也是唯一没有全部炭化变黑的一块。

《上乐金刚》唐卡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通长85.5厘米、轴宽53.2厘米。画面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部分绘上乐金刚双身像，金刚全身裸露，头戴骷髅冠，面部和身躯呈蓝色，双目圆睁，直鼻大耳，左手握金刚铃，右手握金刚杵，双腿弓立，双脚各踩一仰伏状魔。金刚身挂50个骷髅，胯下围虎皮，佩戴项圈、臂钏、手镯、脚镯等饰件，有头光，身后有红色马蹄形身光，内圈绘金色火焰纹，外圈以浅蓝色衬底，绘有佛本生故事人物及鹿、玉兔和花草图案。画面中的明妃亦头戴骷髅冠，颈部佩戴骷髅串珠，饰璎珞、臂钏和腕镯，全身裸露，面部和身躯呈红色，面向金刚，左臂搂抱金刚脖颈，右手上举执双叉勾刀。仰伏两魔下面为仰覆莲花台。主尊上方横置五个小框，每框内均绘有一尊上乐金刚双身像，是主尊的五种化身。主尊下方亦有五个小框，中间三个框内各绘一尊护法金刚，左右两侧小框内各绘一尊祖师像。该唐卡构图对称紧凑，线描细致有力，敷色浓艳，对比强烈，体现了藏密绘画艺术鲜明的风格特征。这种构图、运色、造型等皆见于12世纪前后的西藏唐卡中。

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西夏，长35.4厘米、直径31.6厘米、厚17.3厘米。此扁壶直口台唇，长颈，壶体扁圆，肩部和下腹各有一对带状耳，腹部两面正中各有一圈足，便于卧放。正面圈足周围以剔釉露胎的技法，剔刻出连枝牡丹花纹图案，背面施釉不到底。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良，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它可能由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为西夏人所喜欢的用具。



印婴戏花纹绢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两块绢尺寸分别为长30厘米、宽84厘米和长29.7厘米、宽87厘米。图案完全相同，为童子戏花图。图中的花纹采用连续纹样，其基本构图是一排横置数个圆形花环，环内绘有四朵小白花，环外绘一周连珠纹；另一排横置数个菱形花框，框内也绘有四朵小白花。花框与花环错位排列。花框四边各有一戏花童子。童子的造型和大小完全一样，皆为裸体，面相丰腴，肌体白胖，挺胸鼓腹，右手上举抓一枝条，左手自然下垂也抓一枝条，双腿腾空跃起，肚皮上围一块黄色肚兜，身上饰桃形项圈和环状手镯。党项族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所以，毛纺织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丝织业作为中原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宋代已有很高的水平。西夏一方面通过宋朝每年的“岁赐”以及贸易进口获得大量丝织品，另一方面也逐步发展自己的丝织手工业。西夏建国后，政府机构中设置了“丝绢院”和“绣院”等，专门管理棉、丝和麻纺织业的生产，所出的丝织品有绢、纱、罗绮、绫、锦等。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一些关于丝织生产工序的词语，如“缫丝、染丝线、绣线、纺线工”等，这说明西夏丝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彩绘木桌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佛教在西夏备受尊崇，艺术为佛教所用，或染上佛教的色彩是十分自然的。迄今发现的不少西夏艺术珍品，都为佛事活动的用品。该物就是放置祭祀供品的供桌，长58.5厘米、宽40.5厘米、高32.5厘米，用传统木工卯榫工艺制成。供桌的前后有两个看面，均用双枨、镂空雕花挡板和花牙板装饰。前看面上镂空雕花挡板用双枨隔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又用蜀柱分为三个正方形小框，每框内透雕折枝牡丹花纹；中层分成两个长方形小框，框内亦雕折枝牡丹花纹；下层雕刻四组云头纹饰。后看面上挡板与前看面挡板雕饰基本相同。花牙板位于桌腿外侧，透雕出如意云头纹与卷草纹。桌子通体彩绘，红漆衬底，金色线条勾勒出桌面边沿、桌腿、双枨、蜀柱、挡板和花牙板的轮廓，间施黑色和绿色。整体造型美观大方，镂空雕刻工艺精湛，彩绘华丽而又凝重，虽历经千百年，其色泽、木质保存依旧完好，是一件难得的西夏佛教寺庙用品。



彩绘木雕花瓶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花瓶一对，尺寸分别为通高49厘米、瓶高19.3厘米、腹径7.5厘米、底径8厘米；通高51厘米、瓶高19.3厘米、腹径8.3厘米、底径8.3厘米。该器物由花瓶和花束两部分组成。花瓶为造型、装饰、大小基本相同的一对，瓶、座连体，上部为瓶，下部为座。花瓶口呈喇叭形，颈部细长，腹部鼓圆。底上部为一圆盘，下部为覆钵形，圈足。通体以红色衬底，颈部贴金箔，腹部施金色牡丹花纹，底部以金线勾勒出莲瓣轮廓，腹与底座间的相轮边沿贴金后再用红、绿色彩绘。同时出土两束花，分别插于瓶中。它们各由一根用包裹麻纸的铁丝作主干和若干分支，以及用绢纱制作的花朵和绿叶组成。其中一束花朵用红、白两色，红花又用白色龙骨镶边。另一束的花朵采用紫花瓣、蓝花蕊，色泽艳丽，花姿优美，与花瓶构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整个花瓶形体匀称，线条流畅，装饰华丽，堪称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珍品。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长31.7厘米、宽12厘米、厚1.9厘米，通体呈长方形，封面为黄色，上下边缘有修复的痕迹。西夏文楷书，文字工整秀丽，油墨均匀干净。经折装，上下单栏框，木活字印刷。1917年，在离西夏首都中兴府不远的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辗转传藏，现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宁夏以及日本京都大学等处。它们属于什么时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著名学者王国维断定为元刊本。而这类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无论是属于西夏时期，还是属于元代，其所具备的特点，都证实它们为早期的活字版本。它们不仅成为研究活字印刷技术，而且是研究西夏文字、西夏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鎏金铜座像

元代，1987年青铜峡造纸厂征集。铜质，空心，鎏金，高91.5厘米、宽64厘米。面庞微长，鼻梁俊挺。低眉，垂目，神态安详。身着饰有花边的袈裟，线条流畅。左手置于裸足上，右手置于膝。底座为流动的云台纹，整个佛身趺坐于上。





阿拉伯文宣德铜香炉

明代，洪维宗先生捐赠。铜制，高25.5厘米，口径31.4厘米，腹径35.8厘米，侈口，矮颈，扁鼓腹，口沿附双把环手，底部以矮小的三足支撑整个炉身。外腹壁两大两小四组开光内阳刻有阿拉伯文字，图中这组阿拉伯文译为："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见《古兰经》第122章）"。底款汉文四字篆书"宣德年制"。阿拉伯文构成此炉的主体图案，雕刻手法精细、娴熟，线条婉转流畅，自然雅致，具有韵律之美感。这件铜香炉，铜质精良，造型优美，工艺考究，是一件将冶铸技术与阿拉伯书法绝妙融合为一体的艺术精品，堪称宁夏回族文物中的珍宝。

银熏炉

清代，高67厘米、腹径34厘米、宽50厘米，整体造型非常独特。上部形似葫芦瓶，瓶顶有一头站立的大象，象背驮一小瓶；下部呈圆鼎状，整个器身由三个兽形足支撑。熏炉两侧附有对称的螭龙状的耳饰。其工艺亦十分高超、精细，融铸造、焊接、抛光、镂空、错银等多种工艺于一体。此银熏炉馆藏两件，综合器物的造型特征及纹饰工艺来看，它们可能为当时宫廷赏赐给回族上层人物的用品。

袖珍《古兰经》

清代，1959年5月银川市新城区原马鸿逵兵营建筑施工废墟内出土。纵1.9厘米、横1.4厘米、厚1厘米，原放置于一个精美的铜盒内。书的封面为紫红色牛皮纸，扉页上印有埃及国徽，并印有阿拉伯文，译为："这是尊贵的古兰经，只有内清外洁的人才可以抚摸，穆历1312年"等字，书为优质白纸影印，字迹极为清晰。经专家鉴定，认为是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伊斯兰教历1312年）阿拉伯国家的印刷版本。





1959,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 the explorations of Erlitou site have been carried out more than 60 times in more than 30 years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 finding large areas of groundwork of palace architecture and Miyagi wall clusters, some of which were explored later, as well as criss-crossing roads and huge bronze metallurgy workshops, turquoise manufacturer workshops, and has gotten a large amount of pottery, stone, bone, clam shells, copper, jade, lacquer, bronze artifacts, and the cultivate mold for copper casting. As rema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early formation of large-scale borough, the importance of Erlitou sites in academic study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a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corded, Erlitou site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ancient Xia dynasty, its culture age was also generally in the range of Xia Dynasty. Therefore, Erlitou sites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to explore the cultures of Xia dynas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Scholars have devoted great enthusiasm in the explorations of Xia culture, forming the grand situation of "lett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ublished theses, the length and strength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study have far exceeded that of other academic subjects. The study has got the attention of overseas academes.

NEW DISCOVERIES IN CULTURAL HERITAGE SURVEY

MUSEUM

On August 28, 2008,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was officially opened and put into use. Ningxia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0 pieces of cultural relic collections in Ningxia Museum. And more than 4000 pieces of them are precious relics above Grade Three and 159 of them are identified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of Grade One. Stone-carved Tomb Door of Xuxuan Dance, Gilt Bronze Ox, Lishi Inscribed Support Saddle are identified as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Xixia cultural relics, Hui Ethnic People cultural relics are the focus of the museum's collections so the museum ha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very unique in this country's museums. Helan Mountain Rock Paintings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of the Red Army's western expedition and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period are also very representative.

"The Night Color and the Vast Heaven: Ningxia General History Display", through five chapters, namely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the Home of Animal Husbandry, the Key Town of Silk Road, the Trace of Great Xia, and the Northern Place Having a Climate of South", with rich historical collections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s the diversified culture of Ningxia from the time immemorial to today over 30,000 years, including such cultures with distinct geographical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s water tunnel 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the Silk Road culture, the Western Xia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and so on. Four thematic display series of "Stone-carved History Books, the Numerous Red Flags, A Walk of Home Return and the Glorious Frontier",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original ancestors' thinking at different times, demonstrate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Ningxia rock paintings, show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liberation of Ningxia, display the life, culture and religious custom of Ningxia Hui People as well as the fifty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58.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EMOIR

OVERSEA IMPRESSION

翻译：Wei Liping（魏李萍）